

■ 我思我写

诗歌的未竟之旅

光明磊落的隐私

2006年，我参加青春诗会时写过一句话：诗歌是我省察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个可以看成是我这些年对自己的诗歌写作和个人际遇之间做出的选择。现在，我想在后面再加这样一句：诗歌就是光明磊落的隐私。换句话说，诗歌是对共同心灵感受的个体表达。光明磊落就是诗歌的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隐私就是感受的深刻性和表达的独特性，而它表达的目的就是寻找，就像一匹马寻找它的骑手，一颗心寻找它的对手和亲人。诗歌的确不是写给大多数人看的，它是写给“少数”甚至写给“惟一”的。但这个“少数”和“惟一”也可能是无限的。如果只有内心的触动，我不会完成一首诗，如果只是感慨于外部的物象，我也无法完成我的诗，只有在发现现实和内心触动之间那种微妙的联系时，我才会写下一首诗。

现实是什么？我以为现实就是生活最显豁和最隐秘的层面，就是生活中隐藏的某种真相。而诗歌对现实的表达，不是直接的，应该像一面蒙着灰尘的镜子。它不是对现实一览无余的表达，而是给它蒙上了时间的灰尘，透过光线的散射、折射，照进心灵的某个角落，仿佛一枚纤细的针扎进去，带给你漫长的隐痛。

我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自从很多年前被一列火车带离故乡，我就失去了对自己身份的辨认。之前我一直没有承认，促使我重新拿起笔写下这些分行的文字的，是源于2005年的一列火车。那是在一间废弃的播音室里，它从一本过期的杂志中呼啸而来，它在任性地奔跑时同样裹挟了我，让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奔跑。这些年我写过许多不同题材的诗，它们之间似乎毫无关联，指向了我写作的不同层面。但事实上，这些诗都与我的生活环境、时代变迁有关，与我内心经历的不为人知的私密苦痛有关，与一列从凌晨3点，从虚无的波浪中开出的火车有关。

它一次次向我逼近又渐行渐远，逐渐缩小成一枚针，重新遗失在大海里。现在，我愿意我的诗就是大海里的一枚针，我也有把一座大海搬到针尖上的野心。

想象力与童年经验

不得不承认，一个人之所以能成为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需要与生俱来的很多天赋。技艺方面的东西，经过后天努力，多数诗人都能做到；但对语言的敏感、对诗意的敏锐感悟和捕捉，却更多地依靠一个人的天赋。我有一个不太正确的观点，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诗人，或者说成为一个优秀的诗人，和他先天的禀赋、童年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先天禀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是不是有可能成为一个诗人，这种禀赋包括他的直觉、想象力、对事物的认知力、潜意识里观察事物的角度、从不相关的事务中发现某种内在的隐秘的联系的能力等。而童年经验决定了他会去写什么样的诗，对他日后的抒写策略、题材选择的倾向有着很深的影响。

我小时候是一个有病的孩子，身体孱弱，内心敏感。我有严重的自闭症，一直到大学二年级还差点因为抑郁症退学。是诗歌拯救了我，让我找到了无法从人群中获得的倾诉方式，从而建立了和这个世界的某种内在联系。我的很多诗都是我在凌晨时分写下的与这个世界对话。

至于后天的努力，我觉得无非还是生活经验和阅读经验的相互作用。我相信一个诗歌写作者的才华应该更多地体现在他对身边事物的独到察觉和独特表达上，他能用自己的方式处理现实的日常题材，而不是仅仅依靠书本等间接得来的经验编制一些语言的幻象。这样的写作毫无意义。

如何完成一首诗

诗最早的胚胎，可能是我内心的某种情绪、某种想诉说的愿望，忽然找

到了现实中的某种对应物。这时，我可能用只言片语把这种感受记录下来。但是我觉得这还不是诗。我在记录下后，会有一段时间的沉寂和冷却，直到它再次出现并且逐渐形成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轮廓。这时我会从技术层面去思考，怎么去处理它。戈麦说闪电拒绝修改，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闪电还不是诗，它应该就是灵感，是一首诗的胚胎。一首诗完成，首先要给人一片天空，让闪电有一个妥帖的出场方式。

一首诗的完成，要解决两个问题：发现和呈现。发现就是面对你的写作对象并发现其诗意的能力。一个优秀的诗人肯定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能够从纷繁芜杂的事物表象之间发现某些神秘联系，或者能依靠直觉找到外部世界中与内心感应相对应的物象。这种发现是决定一首诗是否有价值的标准。能从一朵花里看出诗意图足称道，诗人需要的是能从一只烟灰缸中发现诗意图的能力。另外，我们还应该具有随时返回源头的能力，比如胡弦提到水龙头，“这一次它送来的只是它自己”。呈现，就是这样更恰当地把你发现表达出来。一个巧妙的呈现方式，对一首诗来说，并不亚于发现的价值。同样一句话，换个不同的方式说，就会有截然不同的效果。纳博科夫说，艺术的直觉和科学的精微在一瞬间有了美妙的邂逅，一首奇妙的诗就诞生了。

诗歌写作和个人际遇

我生长在北方内陆一个干旱缺水的省份，毕业后又来到东海边的一个渔港古镇谋生，做过教师、记者、行政执法人员、办公室文员等。做记者和安检工作时，我见过人的各种活法，也见过人的各种死法。我想，我的生活经历，是我个人的，也是和我有着类似经历的一代人的。我是个没有身份的人，既回不到故乡，又无法在更多的层面融入到异地。这使我对自己的身份陷入深深的迷惑中。在这样的情状下，在沙与海的巨大跨度下，我把自己看到

的、感受到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打磨成文学作品，我想作品的内容也肯定是具备了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这些年来我写过反映西北历史文化题材的萧关古道系列诗歌，写过我居住的海边渔区生活系列的诗歌，也曾经为我钟爱的一位画家写过诗歌。写“萧关古道”算是一种偿还，如果说我的离开是一种背叛，那么这个系列的诗歌，就算是我的忏悔。而以“冬天的秘密花纹”命名的有关画家安德鲁·怀斯系列诗歌的抒写，则是借助一个相似灵魂的阴影获得内心隐秘的支撑，同时它也更多地寄予了我在诗歌技艺、艺术锻造方面的诉求。而“海边书”系列，则是我面对自己生活了6年之久的渔港小镇所阐发的情感。在那些创作里，我的确是从一滴一滴的海水开始写起，逐步建立了最初的信心，因为有经验的渔民告诉我：“礁石后面，一只贝壳，可以用背部细密的弧线，记录大海的年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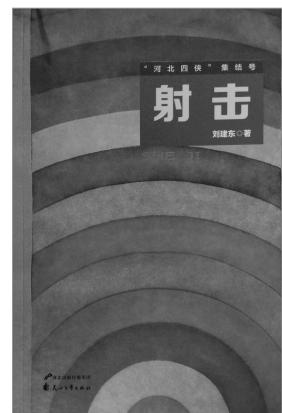
目前我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里，所以我的抒写对象重点就放在了这里。最近一两年我写的“县城”系列组诗引起了一些注意。一些评论家说，这些诗有着宏大的视野，常常着眼于整个时代的风尚变化和现代人的精神苦痛；又有刁钻的视角，往往能从一条街巷、一处建筑、一个人物中获得现实的各种镜像。《人民文学》的编辑朱零说：“《县城》全景式地描写了中国社会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途中的疼痛、喜悦和裂变，他自觉并主动地参与了这个过程，通过自己的切肤之痛，来呈现、揭露、批判并刺穿这个社会的脓肿和腐朽，其实是他对这个国家所怀有的大爱和期待。”我感念这些鼓励。说实话，我在开始写这组诗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我最初的目的只不过是想把我这样的一类人的个人际遇放在县城里来观察、拷问，以此来辨识自己的身份。这也让我对自己的写作有了些自觉的承担意识。只要我还在县城里生活、感知，这个“县城”系列我还会继续写下去，不管对于一座县城的发展变迁还是对于我的写作，我相信这都是一场未竟之旅。

□高鹏程

■ 桃李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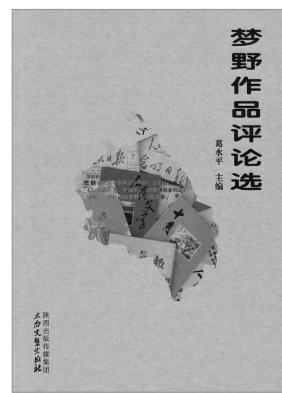
刘建东

是鲁迅文学院第十届高研班学员，其小说集《射击》近日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该小说集为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河北四侠集结号”丛书中的一种。刘建东创作活跃，与同为河北作家的胡学文、李浩、张楚并称为“河北四侠”。他自2002年推出长篇小说《全家福》后，又于2012年创作了长篇小说《一座塔》，两部作品都以极其鲜明的先锋面貌引起文坛瞩目，其在文学形式与内容上的不断探索也被文坛所认可。除长篇小说外，他还创作了许多风格各异的中篇与短篇小说，并出版了不同样式的短篇小说集4种。本书精选了作家近几年的短篇小说共24篇，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能够集中体现作家对于现实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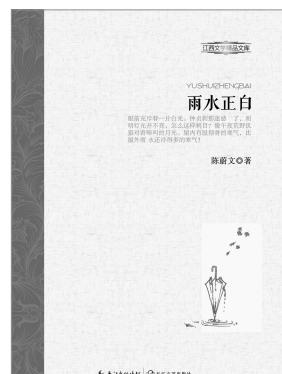
梦野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一届高研班学员。由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葛水平主编，文学批评家孟繁华作序的《梦野作品评论选》，近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本书主要对梦野的诗歌作出了全新的、深刻、独到的解读，对梦野与诗歌、与故乡的精神关联作出了诗意诠释，对其在诗歌方面新的发现和探索给予了肯定。



陈蔚文

为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高研班学员，其中短篇小说集《雨水正白》近日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集收录了陈蔚文多年来创作的小说的精选，共计25万字。其作品多为展现当代人的命运与情感的故事。对于俗世生活中林林总总“小人物”的命运境况，陈蔚文有着执著的关注与独具一格的表现。小说中人物的命运遭际映射出现实人生的困顿。在生活“庸常性”的背后，隐藏着生命的本质。小说秉承了“新写实”小说的写实性，语言机智幽默，同时又深具悲悯的情感温度。



潘小楼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其中中篇小说集《秘密渡口》近日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收入了潘小楼创作的6部中篇小说：《端午》《秘密渡口》《罂粟园》《小满》《青柠》《魁山》。6部中篇小说的6个故事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关联。其作品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小说集以工厂、小镇、乡村为背景，讲述了在世事变幻中命运多舛的各种人物。作家将戏剧文学的表达手法融入小说的创作，试图探索一种新的文学表达形式。



□安琪

每一个中国人从一盘散沙的奴才转变为国家和命运的主人。

人，只有具备内心生活才能成为自己和生活的主人。鲁迅的《呐喊》《彷徨》揭示了中国人祖祖辈辈麻木的精神状态，只想“这样”，不想其实可以“不这样”，可以说，整个新文学运动就是在唤醒人，发展出人的内心生活。

鲁迅等中国知识分子，为中国建立了一种面对自己的内心生活的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与批评有对“内”的恐惧，仿佛只要向“内”转就是个人情调，于是一味地提倡向“外”，其实把文学分为内外是愚蠢的，真正的内心生活永远是向世界敞开的过程，也正是在向世界敞开中才有意义。谁又能文学中分出内外？

新文化运动迄今100多年，寻找内心生活依然是现今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网络时代里，人们每天都面对着这么多的区别，有区别也是与鲁迅新文学的区别。新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紧要关头，梁启超等一批先觉者发现，中国的问题不是武器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要使中国成为强国，首先要改造人，使

人人都嫉恶如仇，但在现实生活中，你却发现，好人也不那么好找。这是中国的现实。

雨果的幸运在于，当他为人物内心生活作出选择时，尽管如此艰难，读者依然相信——这不仅是因为作家的能力、笔力，以及作家有一套预设的精神支撑，还因为他作品的真实性在他的时代有说服力。

同样的情节，在中国语境中会成为笑柄，成为不可信。在中国，精神性背景的支撑往往不足。真实和不真实取决于作者和读者对真实的共识范围。但文学创造之所以是创造，就在于挑战可能性的共识。

当然，说是容易的，做起来也许还是困难。说到底，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不是技巧问题，而是给人物一个真实的内心生活。中国作家要向前辈学习，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去接近、抓住、看清这个时代的人心。时代和人心中有很多苟且，恰恰是中国作家应该打开的。

时代和人心中还有很多沉默的区域，打开了，就是一条新的道路。

□薛喜君

她讲对八卦图中阴阳符号的认识，讲文本中的哲学性、思想性，我们从傍晚谈到凌晨，再从凌晨回到傍晚。她眼神儿里的纯粹，她说起文学时的神采飞扬，都令我陶醉。我热血沸腾，我被哲学、文学浇灌得神魂颠倒。

青瑜——是栽植于我房间里的

一株梅，是栽种在我心中的一株终将盛开的梅。

我终于在鲁院的园子里见识了梅，在鲁院的房间结识了梅。是前世的约定？还是文学的力量？我想，一切都是缘。我与鲁院园子里梅的约会。我与房间里的梅探讨哲学、文学。我想，梅不会再让我错过她高雅圣洁的美丽了吧。因为我已经错过了故乡厚重的秋，我还将在错过故乡萧瑟的冬。我突然想起“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诗，我怔住的那一瞬间，突然顿悟了我对梅的爱。

当满院子飘飞着“银杏蝴蝶”，当池塘里结了一层薄冰，当垂柳的叶子像剪刀似的刷刷落下来，我想，离开梅的日子也不远了。我也没有能力挣脱世俗，我只能携着房间里的那株梅——青瑜小姐，来到梅园，与大师们一道赏雪咏梅。



鲁镇
白桦林

■ 东庄西苑

内心生活

2013年3月11日，在鲁院，我聆听了李敬泽的讲课，题为《内在性的难题》。敬泽老师气场很足，他一坐上讲台，全场便有一股沉郁的气息。音质浑厚、语速缓慢、语句有力，是他讲话的特点。

敬泽老师从刚刚观看的电影《悲惨世界》说起，他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好到“此生我们看不到这么好的电影了”（他发给电影界朋友的短信，得到的回答是：此生我们看不到这么好的小说了）。敬泽老师初中开始读小说《悲惨世界》，那是一个不知高考为何物的年代，除了玩，就是读小说。他说，这部写于19世纪上半叶的小说，到现在都感动、影响着我们，当我们讲到文学的荣耀时，我们能从雨果身上感受到。从《悲惨世界》，我们知道经典的力量，就在于能带领我们回到人生中一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来。《悲惨世界》告诉我们，生命有另外一种可能：爱的可能性。

从《悲惨世界》入手，敬泽老师分析了小说中大量的自我对话（批评术

语叫“内心独白”），它其实是主人公的自我倾诉与倾听。人之所以有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人有自我对话的能力，有自己的内心生活。但中国传统小说，没有一部以“我”为第一人称的小说，也没有如同《悲惨世界》一样和自己对话的小说。当一个人能跟自己对话时，他就是对自己负责的人，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很伟大，第一次以“我”为小说的主人公，出现了第一次自我对话。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新文学。

谈到新文学，敬泽老师回想起有一次参加主题为网络时代武侠小说、神话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的研讨会，他在发言中说，武侠小说和神话小说本来就是传统小说的延续，并无多少区别，有区别也是与鲁迅新文学的区别。新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紧要关头，梁启超等一批先觉者发现，中国的问题不是武器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要使中国成为强国，首先要改造人，使

每一个中国人从一盘散沙的奴才转变为国家和命运的主人。

人，只有具备内心生活才能成为自己和生活的主人。鲁迅的《呐喊》《彷徨》揭示了中国人祖祖辈辈麻木的精神状态，只想“这样”，不想其实可以“不这样”，可以说，整个新文学运动就是在唤醒人，发展出人的内心生活。

新文化运动迄今100多年，寻找内心生活依然是现今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网络时代里，人们每天都面对着这么多的区别，有区别也是与鲁迅新文学的区别。新文学发生的历史背景是在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历史紧要关头，梁启超等一批先觉者发现，中国的问题不是武器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要使中国成为强国，首先要改造人，使

人人都嫉恶如仇，但在现实生活中，你却发现，好人也不那么好找。这是中国的现实。

雨果的幸运在于，当他为人物内心生活作出选择时，尽管如此艰难，读者依然相信——这不仅是因为作家的能力、笔力，以及作家有一套预设的精神支撑，还因为他作品的真实性在他的时代有说服力。

同样的情节，在中国语境中会成为笑柄，成为不可信。在中国，精神性背景的支撑往往不足。真实和不真实取决于作者和读者对真实的共识范围。但文学创造之所以是创造，就在于挑战可能性的共识。

当然，说是容易的，做起来也许还是困难。说到底，中国作家面临的问题不是技巧问题，而是给人物一个真实的内心生活。中国作家要向前辈学习，要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去接近、抓住、看清这个时代的人心。时代和人心中有很多苟且，恰恰是中国作家应该打开的。

时代和人心中还有很多沉默的区域，打开了，就是一条新的道路。

梅园

鲁院的庭院里有块不大的园子，我称其为梅园。其实，园子里还有白玉兰、木槿、木棉、竹子、龙爪槐、银杏树、苹果树、柿子树等，园子边上还有一洼不大的池塘，池塘里有鱼，岸边还有垂柳。园子里既然有这么多的植物，怎能将其妄称“梅园”呢？可那些植物，又怎能与江南的梅媲美。它们都无法抵挡梅的风韵。

所以，我固执地称其为梅园。

清晨，我在啁啾的鸟鸣声中中信步走进梅园。这时候的梅园空气湿润清新，我宛若喝了一杯刚泡好的新鲜绿茶，清香在舌尖上悠然地游走。傍晚，我在夕阳的余晖下走进梅园。我又宛若喝了一壶烈酒，两坨腮红涤荡了心头上的尘埃。我本是生活在世间的凡人，因为走进了文学，走进了文学圣殿，才有幸走进梅园。走进梅园，我便有了神性的从容。我仿佛是一个从没沾染过尘世的仙人，带着微笑，品咂着梅香穿行在梅园里。我细细地欣赏着梅的身姿，梅的高雅，梅的圣洁——我的心头油然地生出万般感慨来。我早已习惯于内心的生活，尽管我也知道，外部所谓的多姿

多彩都不可能消除心灵的饥渴。我也知道，越是珍视心灵存在，越是注重灵魂自由，就越会发现外部生活的局限。梅能让我在活动中沉思，在沉思中感受。由此我想到爱，想到情，世间的爱都能打动我，世间的感情都能俘获我，哪怕是几句歌唱爱的诗、咏颂情的歌，都能击中我心中的柔软。从梅园里走出来，我便走进另一个世界。还有一株未经任何粉饰雕琢、刚直不阿的梅正等着我。走进房间，我便从梅的世界走进了另一株梅的心灵。她从西方哲学、语言学、符号学开始起步，从《芬尼根守夜》的文本里，从乔伊斯语言的世界里，一直走进中国古典哲学的深处。她提出“以事载道”，因为她在研究八卦和中国语言学时，发现了言和意之间没有直接的互生关系，从言到意必须要有一个中转站——象。她一头扎进中外名著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屏气凝神地研读。身为笔记体小说家，被称为“小小说之王”的父亲，是她文学的启蒙恩师。她牢记着父亲的每一句话，父亲说，“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值

得学习的地方”；“只有靠自己能力拱出来，才是真的拱出来……”2013年的夏天，她挚爱的父亲走了，她心中的一座大山轰然坍塌。她伏在父亲的身上号啕，对着父亲的照片大哭，可亡父却不知女儿的痛，仍然以定格的微笑看着她——她并没有就此沉浸在悲哀里，而是把哀痛化成一股力量，或许这力量是父亲给的，她每晚写作至凌晨。写作之前，她先给父亲倒一杯水，然后跪在父亲的遗像前，向父亲报告成绩：“爸，《南方文坛》今天发表了我的一篇评论。可是，女儿却再也听不到您或表扬或批评的话语了。您知道女儿那种撕心裂肺的心痛吗？”她还向父亲承诺，说自己一定会像父亲一样努力，一样严谨。父亲能把家乡写成一片森林，她一定会是这森林中的一棵树，并把根深深地扎进传统文学的土壤里。她讲对八卦图中阴阳符号的认识，讲文本中的哲学性、思想性，我们从傍晚谈到凌晨，再从凌晨回到傍晚。她眼神儿里的纯粹，她说起文学时的神采飞扬，都令我陶醉。我热血沸腾，我被哲学、文学浇灌得神魂颠倒。

青瑜——是栽植于我房间里的

一株梅，是栽种在我心中的一株终将盛开的梅。

我终于在鲁院的园子里见识了梅，在鲁院的房间结识了梅。是前世的约定？还是文学的力量？我想，一切都是缘。我与鲁院园子里梅的约会。我与房间里的梅探讨哲学、文学。我想